

序

序

本集爲抗戰以來所撰有關政治性論文之第一結集，起自二十七年國慶日，訖於三十三年國慶日，凡得文三十二篇，大率皆曾發表於成都新中國日報。其屬於學術思想性者不錄，無關宏旨者不錄。余生平文字不自愛惜，手頭所能獲得者止此，三十三年國慶以後之論文，留待另集，所節去蓋已多矣。所論雖非一端，要皆於舉國躁擾中一服清涼劑，故名之曰清寧集云。

三十六年兒童節 作者自記

序	四七
克誠	五一
此時還有徘徊瞻顧的餘地嗎？	五三
正人心，息流言，拒邪說，惟有請政府立即正式宣布既定國策不變	五六
抗戰與民主	五九
建國與法治	六二
苦幹與樂幹	六六
無為政治論	七〇
他山之言與吾人之反省	八五
戰後國策研究的重要	八八
戰後國際局勢	九四
過去的錯誤	一〇二
建設戰後世界的幾個原則	一〇九
民主運動者應有的風度	一一五
把握物價問題的中心點	一二三
中英文化之異同	一二六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人物與風氣	一三〇
國策比國都更重要	一三五
衍人荒	一四〇
教文莫如質	一四三
憲法及其背後的力量	一四八
論學者當知所以口處之道	一五一
論熱中	一五五
現實主義與國際政治	一五八
遙贈威爾基先生	一六一
國防與外交	一六五
政治與軍事	一六九
變化裏的統一	一七二
超過和戰的戰爭	一七四
培養事業精神	一七七
貝當將何以見法人	一八〇
戰後處置日本問題	一八三
回憶過去，創造將來	一九一

清寧集

立誠

處危疑震撼之際，當大任者無他術，要在「誠」而已。

誠則有切切實實爲國爲民之心，不矜才，不使氣，不譁衆取寵，不立門戶之見，不爭枝節，不但圖苟且敷衍，能如此，庶幾可以任非常之事。

能誠則能仁，必有與生民共憂樂的誠意，然後始能切切實實感到生民的痛苦，而後有不忍人之心。仁是從同情心上發出來的，若是對人對事都無誠意，那裏有同情心可言？

能誠則能知，中庸說：「誠則明」，又說「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人能以一誠遇人遇事，則自無我見，無意氣，無偏私。天下事利害本不難知，只是褊心私見作梗耳。一誠則萬蔽皆去，然後可以談真知灼見。

能誠則又能勇。凡人之所以無勇者。只是把個人的小利害攪在大事裏去，以致遇事

顧忌耳。誠則無不公，公則無個人利害之見，於是才有真勇。

今天國事至此，皆維新以來四十年中一切担當國事的政治家，一切談論國事的政論家，對國計民生缺少誠意所致。現在一切術取計詐的手法都已成了慶奠土飯，人人見慣，無所用之，有擔當國事的責任者或準備擔當國事的人，都應該先從「立誠」入手才好。

——二七、一〇、一〇、國論週刊（重慶版）第五期——

此時還有徘徊瞻顧的餘地嗎？

隨着廣州武漢的相繼失陷，一部分素來悲觀動搖的分子又皇皇然起來了。

對於持這種論調的人，我們只指出一個最基本的事實給他們去反省。日本的大陸政策是四十年來一貫的既定政策，滅亡整個中國乃是大陸政策的第一個階段，今天的戰爭，不是一個誰勝誰敗的問題，乃是中國願意變為朝鮮琉球第二與否的問題，妄想犧牲一部分權利來換取西南西北各省安全的人，似乎忘記了這個最基本的事實。

假如妥協能夠換得一部分未淪陷區域的苟安，也許還有討論之餘地，然而這個安是苟不下去的。他們忘記了塘沽協定的教訓，塘沽協定後繼之以冀察政委會，總算對敵人盡恭順之能事了，然而不久仍有蘆溝橋事變發生，今日而言妥協，不過再來一套放大的塘沽協定，放大的冀察政委會，試問昔日敵人對於華北局部尚不容冀察政委會式的政權存在，今日能容許一個放大的冀察政委會永久存在西南各省嗎？

稍微研究過歷史的人，都曉得北宋之末，南宋之初，金人即屢次以議和誘宋，結果片時的和平接着就來一次更大的侵犯，若不是黃天蕩和順昌兩次大捷，就是秦檜式的政

權也不會被容許存在的。必須能戰而後能和，在今日的狀況之下，只有投降與否的問題，根本沒有和戰的問題。

也許動搖的人要問在今日情勢之下，如何繼續戰法？對於這種問題我們不必替他們舉出長期抗戰的種種戰略上的勝算，因為這些話他們都認為是幻想，我們只要反問他們，不戰又有什麼辦法？假如敵人在片時的和平之下，懈怠了我們的士氣，肅清了後方的全民武裝勢力之後，誰能担保他不再向西南西北進攻？那時候又該怎樣？

我們應該明白，今天日本不是僅僅反對某一個人，某一個黨的政權，今天日本是要整個吞併全中國，況且這種企圖，也不始於今日，在北洋系袁世凱政權之下，日本已經有二十一條第五號的要求提出了。今天就是讓王克敏和梁鴻志來統治中國，日本依然不能滿意，我們還應該注意，秩父宮殿下已經在華南戰事中登場了，日本對於未來統治中國作何整頓的打算，也就可想而知了。

今天若抗戰到底，無論勝負大家還是一條心，一旦國策改變，對外未必能安，對內先分裂為兩條陣線，一切革命的，勇敢的分子站在一面，而苟安的，妥協的分子又站在一面，這正是敵人所求之不得的。

我們必須有與敵人同歸於盡的勇氣，然後才能希望敵人知難而退。對於敵人力量估

計過小，固然是誇大狂，對於敵人力量估計過大，也容易陷入錯誤的打算。

我相信今日中國，一切妥協的主張不會成爲有力的運動；如果有，我誠懇地希望他們覺悟：苟安不是長久的辦法，投降不足以救了中國，一切誠意爲國的分分子，應該一致努力安定人心，團結意志，打銷動搖的理論，繼續發動全民抗戰，將暴敵拖下深坑裏去。

——二七、一二、二八、成都新中國日報——

正人心，息流言，拒邪說，惟有請政府立即正

式宣佈既定國策不變

今天沒有和與戰的問題，只有投降與不投降的問題；沒有犧牲某一部分領土以保全其他領土的問題，只有整個中國存亡的問題；沒有打倒某一黨一黨而扶起他人他黨的問題，只有整個中國民族是否願作日本奴隸的問題。安坐在後方的人，也許沒有嘗過倭寇的利害，以為倭寇的貪慾終有止境，如果許他們一點利益，也許可以換得剩餘區域的片時的苟安，不知道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倭寇的野心在田中奏章內早已表現得明明白白，她不止要拿整個的中國，連印度，安南，暹羅，馬來半島和西伯利亞，中亞細亞都在她的大陸帝國計劃之內，今天還妄想靠妥協來保持四川，雲南，貴州等省安全的人，非愚則妄！

我們應該記得日本不但不要「蔣政權」，也不要「袁政權」，不但不要抗日各黨派所聯合支持下的國民政府，也不要參有漢奸分子的冀察政委會式的政府；不但不能許中國有一個統一的中心勢力存在，也不許中國有真正的地方割據勢力存在；不但不能許忠誠愛

國分子，過問國事，也不許親日聯日的分子真正掌握政權。滿洲偽國的忠臣鄭孝胥總算是對日本極端親善的了，然而尚不容於倭寇，被擯下台，含憤以死；今天主張對日讓步的人，自問對日的誠意誰能超過於鄭孝胥？鄭孝胥尚不能容其執政，何況不如鄭孝胥者。

今天中國多抗戰一天，日本就得多一天用她準備以開發佔領區域的財力，用她準備以肅清佔領區域的兵力，來繼續維持對我作戰，換言之，就是不能完成她的真正佔領，統治，和利用，反之，如果我們此刻對日妥協，就是給予日本以肅清後方的機會，後方肅清之後，再來編練中國壯丁，利用中國資源，以中國來打中國，那時我後方省分之所謂安全依然是夢想，而我軍民上下的士氣，經過一番妥協讓步之後，必然銷沈頹廢，再無法鼓起抗戰的勇氣，勝負存亡之數，不問可知。九一八事變以後，就因為我國不即刻作戰，以致日寇得從容肅清東北的義勇軍，安定後方，到今日才能運用一部分東北同胞來對自己國人作戰，這個教訓，豈可忘記？

今日正是國家生死存亡的大關頭，政府和國民的意志如何，決定了有五千年歷史的中華民族今後的命運，我們應該知道，今日中國若亡，很難再有翻身之日，因為日寇不是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滿洲之流，單就運用嗎啡白丸一項政策的毒辣手腕而言，

也可以使四萬萬民族斷子絕孫，永歸消滅。而妥協讓步，就是亡國滅種的一個重要步驟。

今天只要繼續抗戰下去，我們在敵人後方還有百萬以上的游擊勢力，永遠不會消滅，一旦和平妥協之後，這些人至少有一半要因灰心喪氣而退出了游擊的工作，這是自殺的政策。

事實上不但中國的民意決不許主和的空氣抬頭，就是日本今日在坂垣等極端派勢力掌握之下，又在佔領了廣州武漢之後，正夢想着一舉而完成滅亡整個中國的大野心，也決無對我妥協讓步之可能。我們賢明的最高領袖及政府，也已有非正式的繼續抗戰的表示，不過流言還是不免。因此爲正人心，息流言，拒邪說以一國是起見，我以爲應該迅速發動全國輿論，請政府立即正式宣佈既定國策不變，非到日軍完全退出佔領區域，恢復九一八以前的狀態，決不言和。

——二七、一二、三一、新中國日報——

按此文發表於武漢廣州失守以後，汪精衛出走之前，當時周佛海尙任國民黨中宣部長，正在製造求和之輿論，見此文後，大爲驚訝，曾自重慶以長途電話向報館詢問作者姓名，經報紙負責人嚴拒始已。

三六、三、五、作者追記於上海

抗戰與民主

這一次參政會中最重要最有意義的提案，莫過於周參政員覽等五十一人所提的「請確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國基礎」一案，原文已經中央社發表，閱者想都已看過，無待複述。

有些人以為抗戰時期，談不到民主，因為抗戰時期即是軍政時期，軍政時期應該是「軍事第一，國防第一，」軍事以服從為主，以號令貫徹，整齊劃一為主，因此根本與民主政治是不相容的，在抗戰期間來談民主，未免為時過早。

這種話實似是而非，這樣的說法，不但不懂民主，而且也不懂軍事，更不懂民族革命戰爭性質下的軍事。

我們知道軍事決不是單講服從，單講整齊劃一，一味服從被動的軍事是舊時封建專制時代殘餘下的舊制度，這種制度把兵士當作機械，當作一味被動毫無自主志願的奴隸，只要趕上戰場就算完事，結果戰爭並非出於士兵的自願，當然更與全國人民無干，這樣的軍隊，一與有民主精神的軍隊相遇，就非失敗不可，這種整齊劃一性的舊式的軍

隊組織，至普魯士腓特烈克大王而登峯造極，腓特烈克當時所遇的敵人是比他更專制，更守舊的軍隊，因此能夠屢戰屢勝，但到他死後不過二十年，他的軍隊就大敗於法國革命後民主化的軍隊之手，直到後來普魯士在沙恩好斯特指導之下，改組了舊式的制度，採取國民兵役制度，將軍事和政治一齊民主化，才又有一八一三年利比瑟的勝利。

從此以後，歐洲大陸上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軍事組織，一種是普魯士化的服從性的軍隊，另一種是法國大革命化的民主性軍隊，前者一味講究服從紀律，講究外表，後者則注重民主自由，注重內心自動的志願，事實上每一次戰爭證明了服裝整齊，機械規律的專制軍隊戰不過凌亂鬆雜，自由自動的民主軍隊，一七九二年普奧聯軍之敗於法國革命軍，一八一三年拿破崙的大軍隊之敗於普魯士民兵，一九一八年德軍之敗於英法美等民主軍隊，乃至荷蘭獨立軍之戰勝西班牙，美國獨立軍之戰勝英軍，都是歷史上有力的證明。

我國這次的抗戰，根據蔣委員長的解釋，無疑地是一種民族革命解放的戰爭，講器械，講服裝，講專門的訓練，我軍都不如敵人，我們所靠以爭取勝利的就是全國軍民自動憤發的作戰精神，而這種精神就是最後的淵源，只有在廣大的民衆都自動起來爭取勝利的條件之下，才有最後決勝的可能，爲着這個，我們必須拋棄一切普魯士化的舊

軍事觀念，採取更進步，更改革的觀點，允許全國民衆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信仰上的充分民主權利，使人民和由人民產生的軍隊都知道國家是全民的國家，作戰是爲保護全民福利而作戰，不是爲保護某一部分少數特殊人物的地位利益而作戰，這樣才能貫徹了民族革命解放戰爭的目的，達到了最高領袖所指示的方針。

前幾天報上曾被露菲利濱先鋒報對於中日戰爭的批評，有兩句話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這兩句就是說：『在近代戰爭之中，軍事國家，封建國家自不如自由開明的國家能支持長期戰爭』日本是一個「軍事封建」的國家，是無疑的了，我們果然已經完全做到了「自由開明」的地步了嗎？如果還待努力，就應該趕快向這個目標去努力，這不但不能妨礙及抗戰，並且是爭取抗戰勝利的唯一要素。

——二八年八月日未詳——新中國日報——

建國與法治

建國之道，經緯多端，而其要在於建設法治的國家以代替人治的國家。

近數年來，國家在最高領袖指導之下，統一已漸著規模，建設也突飛猛進，這誠然是可樂觀的現象，但是這種樂觀是有限度的。因為這些成績完全是靠著最高領袖的苦幹精神，和其左右一部分專門人才的努力所造成的。人爲的成分勝過了制度的成分，因此如果一旦主持的人稍有疏忽，或人事稍有變易，則一切辛苦的建設均將有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之虞。

近代國家所以和舊式國家不同之點，就在以法治代替了人治，一切政治的基礎都建設在制度上，無論主持者是什麼人，都得就法治的範圍，不但不許他越法作惡，也不許他越法作善，這樣才是長治久安之道。

譬如就懲治貪污說，與其設許多監察牒探的人員，今天舉發一個案子，明天懲辦一個官吏，不如實行會計獨立制度，使經手官吏無從染指，貪污不禁自。

又如就杜絕倖進說，與其三令五申，告誡大官援引故舊，不如實行考試及銓敘制

度，使官吏進身必須出自考試，按格升轉，則夤緣奔競之風，自然可以杜絕。

從前韓復榘在山東，自己要親自訪察官吏的賢不肖，要訪問民間的疾苦，要審判民間的案件，用心未始不善，但是弄得詐偽百出，政治仍然不能清明，這就是所謂勞而不知爲政。

中國各項事業中以郵政辦理最爲完善，並不是郵務人員特別要比其他公務員清慎勤敏，祇是由於當初郵政在外人指導之下，建立了法治的規模，所以雖然人事屢經變更，依然不曾腐化，這個原故大可以供人深長思一下。

大凡在上位的人，總不願意受法律制度的束縛，總希望多有點自由活動的餘地，這種動機是可以原諒的，但是結果靠一個人的力量去訪察弊政，懲治貪污，不過使作偽之風更精密了一些，於事仍然無補，從前有個大官，獎勵儉德，見了奢侈的屬員就要罵，結果大家當他的面做出寒酸的樣子，背後依舊大嫖大賭大吃大喝，這種人治政策不過獎勵人民作偽罷了。

商子說得好：

「世之爲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

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不以法論智能賢不肖者，惟堯，而世不盡爲堯，是故先王知自謙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修權篇）

尹文子也說：

「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大道下）

韓非子也說：

「人主者，非目若雖聵，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固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姦劫弑篇）

「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難三篇）

慎子也說：

「君人者會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雖當，望輕無已，君會法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之用策，分田之用鈎，非以策鈎爲過於人智，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

建國與法治

躬，則事勲於法。法之所以加，各以分，蒙賞罰，而無望於君。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內篇）

昔諸葛亮治蜀，「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齒，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三國志本傳）——，諸葛武侯的這種法治精神是很值得後人做效的。

——二八年、第二一一號新中國日報（月日未詳）——

苦幹與樂幹

抗戰時期應該埋頭苦幹，這話不成問題。

不過所謂「埋頭苦幹」這一句話裏面，應該注重的是一個「幹」字，而不是一個「苦」字。應該解釋為雖苦猶幹，而不應解釋為凡幹必苦，假使苦儘管苦，但是苦而不幹，這苦便不免是白吃苦頭，如果幹也幹了，但是幹而不苦，那豈不更容易提起人的幹勁。

大凡厭苦趨樂乃是人之常情，凡做一件事情，要求效率的增進，與其用鞭策來趕他，不如用糖果來誘他，人能對於所做的事業感覺興趣，感覺其樂陶陶，則不必鞭策自能蹈厲奮發，其效率遠倍於一味苦幹者。現代的新教育家如蒙台梭利之流，對於兒童都主張用誘導的方法，來代替禁止的方法，現代的新企業家如福特之流，對於工人也都主張用減少工作時間，增加娛樂設備的方法，來代替舊式視工人如牛馬的鞭策方法，結果其成效遠過於一味苦幹的方法之上。教育如此，企業如此，政治也是如此。因為一切事業都不能遠於人情，遠於人情的作法結果只有驅人作偽。孔子也曾說過：「知之者不如

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研究工作心理學的人，都知道人類的心理有緊張的時候，也必須有弛放的時候，假使一味張而不弛，結果必使心理逐漸趨於麻痺，工作效率反而減低。一個人日常的生活不能沒有休息和睡眠時間，休息與睡眠並不是浪費精力，乃是恢復精力的主要辦法，一張一弛，是天道，也是人道。所以孔子說：「藏焉，休焉，息焉，遊焉」，老子也說：「當其無，有車之用」。

人類的心理機構至為微妙，有時候看起來似乎是天天緊張，其實暗中已埋伏下弛廢的根源，有時候看起來似乎是弛散，其實暗中已儲蓄下工作的精力。一個人如與前半生生活過於刻苦，過於嚴肅，到了暮年控制能力一弛緩，必然反動到荒唐的境地，所以道學家反動起來特別淫蕩，吝嗇者反動起來特別浪費，因為人類的感情是不能一味壓抑的，壓抑過度，不趨反動，即趨頹廢。善於養生的人，應該使他常常有藏休息遊的機會，則感情有相當的調節，始不至於極決。治心之道如此，治國之道亦不外如此。

中國維新四十年來的政治，有一個一貫的錯誤，就是不懂得一張一弛的道理，一味『揠苗助長』，結果反使『苗則稿矣』。對於國民教育一味鼓吹悲觀喪氣的國恥教育，而不知提倡發揚蹈厲的國慶教育，甚至連國慶日都停止慶賀，結果悲觀失敗的空氣充滿

國中，使民族自認爲低能落伍者，因而養成中國必亡的信念。對於民衆娛樂也一味取壓抑的政策，甚至連廟宇都要搗毀，戲劇都要禁止，結果人人無樂生之心，也就連帶地無積極奮發之氣。這都是過去一般維新志士的短視自殺政策所致。

今天要抗戰必須使全國軍民勇於赴義，有樂關之心，無苟安之念。必須使人人視戰場如樂土，視國家如天堂，欲求其如此，就必須改變一向的禁止娛樂的政策，轉而積極獎勵。種娛樂，獎勵人人對於生活的享樂態度，使全國充滿生氣，然後國家始有生機。

誠然，在前方將士浴血苦戰之際，在一般民衆求生不得之際，後方少數公務員一味花天酒地，驕奢淫佚；實在是應該加以糾正，但是這種風氣決不是用消極的禁止政策所能改變的，並且有些無關大體的娛樂，實在也用不着去禁止。與其禁止公務員跳舞，不如提倡集團跳舞來代替個人的跳舞，與其禁止婦女燙髮，不如徵收高額的燙髮捐以補助戰費，與其限定筵席的費用使閨人趨於作偽，以小賤的名義來代替正費。不如寓禁於征，使社會經濟得以流通，擁有厚資者也可以交際而兼救國，至於如果說前方太苦，後方太樂，人民太苦，官僚太樂，那就應該從提高前方將士和下層民衆的生活福利着手。譬如可以徵發屬後方的娼妓編爲慰勞隊去前方調節士兵的性問題，可以徵收上層社會的奢侈稅娛樂稅以作普及民衆娛樂設備的基金，徵收一切私人的園林邸舍來作民衆的

游覽場，提倡集團運動的游藝，以發揚民衆的情感。如最近本市建軍宣傳第一日的提燈火炬遊行之類，這都是比較賢明的辦法。

太史公說得好：「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能懂得這個道理，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如果不懂這個道理，那便是韓非子所說的，「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了。

——第二一二號新中國日報（月日未詳）——

無爲政治論

『無爲政治』爲我國二千年來民族政治哲學思想之結晶，垂諸經典，見諸實際，二千年來，聖哲相承，翁無異議，自吾生之後，受外力之刺激，而後民族思想，翻然一變，向之奉爲經訓者，至是羣焉詬病之，目爲亡國弱種之學說，四十年來，朝野談政治者，罔不以建設改革爲急務，建設也，改革也。胥「有爲政治」之作法也，在此潮流之下，無爲政治之爲人所詬病固其宜矣，猶憶六七年前，胡適之先生鑒於當時所謂建設事業者之病民，於獨立評論上方主無爲之說，并闡明漢初陸賈新語之說以爲輪助，愚當時深贊其說，曾爲文以應之。無如潮流所趨，非一二人所能挽回，適之先生至以此爲人目爲落伍，反動。今者國難日深，世變日亟，謀國是者方以積極建設，迎頭趕上爲立國之大經大法，凡百興革，齊頭并進，惟日不足，於斯時也，而忽揭無爲政治之說，無亦過於違反時代之心理乎？雖然，愚將有說以處此。

夫無爲政治之所以爲人詬病者，曰此黃老之說也，閉關自守時代之思想也，非所以語於大戰國之時代，不知黃老之徒固唱無爲政治，而無爲政治非黃老一家所能專有，實

古代中國各家思想共同之趨向，儒家主制禮作樂者也，然孔子之論政治，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成焉」。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凡此所言，未嘗有一毫作爲之意。其欲奮然有所設施者，獨周禮一書，則漢代迂儒之僞製也，王莽用之，以殘其民。以覆其國，以殺其身。法家者流，世以爲「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不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者也，然韓非之論政也，則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以待之，彼自以之」，曰「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慮則下飾辭，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教，審罰賞」，曰「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曰「用一之道，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倚，故聖人執一而節，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世皆以商君廢井田，開阡陌，爲千古變法革命之始，不知井田至商君之世，久已廢爲阡陌，商君特因之而已，秦皇李斯之廢封建立郡縣，亦不過因時之變而爲之制其宜而已，法家曷嘗不重無爲哉。由此觀之，先秦之世，諸子百家，雖齊流并進，而論政之要，則一歸於無爲，而考其制論之世，則正值戰國紛爭之時代，非一統承平以後之議論也，秦漢而

後，善觀歷史消息而斐然制作成一家之言者，莫過於太史公，其論政也，則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太史公豈苟簡之徒哉，彼亦深識夫中國文化之精神與夫為政之當要，而始發為此言而已，故曰無為政治為中國民族政治哲學之結晶者，非過情之譽也。

夫無為政治之所以為今世耳食之徒所詬病者，其故蓋由於誤解「無為」之意義，彼蓋以委心任運，偷惰苟安為無為也。不知先秦諸家之所謂無為者，乃指政府不當妄想包辦一切，惟應因勢利導，使人人自動發揮其力量耳，非盡天下而束縛斲喪之也。故曰「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以待之，彼自以之」曰「四方來效」曰「彼自以之」，是政府自居於無為而導天下以有為也，無論任何國家之政府，比諸民衆，究居少數，以少數政府官吏之精神才力，欲包辦盡一切事務，其用力雖甚勤，而收效必甚寡，即使所有官吏奉公守法，鞠躬盡瘁，天下待辦之事正多，亦豈能一一皆舉其事，而況官吏未必盡為循良，政令未必盡能美善，徒恃人主一人之聰明才力，察察為明，今日設一官，明日布一令，後日殺一人，號稱奮發有為，實則死灰槁木遍天下，而惟人主一人勤勞至死，終無濟於事而已，古之人有行之者，王莽是也，明佛宗是也。若此之所謂有為者，少數人之有為而束縛天下使盡成無為而已，堯雖賢豈能代天下人耕，舜雖賢豈能代天下女織，此

其所以用力甚勤而收效甚寡也，無為政治者則不然，為人上者，以虛靜自處，以因勢利用，鼓天下之智而不自見其智，動天下之力而不自用其力，因天下之利而利之，則人人樂於有為，人人樂於有為則不必鞭笞撻伐爾國自治。故曰「無為而無不為」。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指也，曰「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此即老子「常其無有車之用」之意。豈惟道。知此哉，中國民族政治哲學之傳統精神蓋胥不外此也。

而或者謂凡此所言，皆平世之論，不可施於據亂之世。大抵承平一統之朝，欲民之安靜不擾，故無為之說尚焉，方今列國並立，武競是務，有國者方且日日申做其國人而惟恐不及，一日之懈，遺禍百年，方斯時也。何敢言無為，又何忍言無為？況今日抗戰建國，百務並舉，前方之整軍經武，後方之建設統制，在在皆需以大有為之人，領導大有為之業，以世界形勢言如彼，以國家需要言如此，是以二十世紀以後，一切國家皆已放棄自由放任之政策，而羣趨於干涉統制，政府之干涉統制最力者，其國勢亦最強，反之則雖以英法席豐履厚之國，不免於戰敗，此豈言無為為政治之時乎？此其言似矣，然而

猶未暇深考也，爲斯論者，但見他人建設計劃之孟晉，與乎干涉統制之奏功，遂以爲任何國家，皆可循斯涂軌，一蹴而及，而不知凡興一利，舉一事，其間必有一定不可越之步驟，良工不能爲無筭之築，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人但見現代強國之突飛猛進，而不知其奠基實在於數世以前，使無十八世紀以來普魯士之軍事組織與夫官僚政治之訓練，則希特勒雖英雄不能以八年而舉席捲全歐之大業，使無大彼得以後現代化之基礎，則布爾什維克黨人雖日日言五年建設，亦豈能於咄嗟間造成國防之完整壁壘乎？夫言建設則人才經濟皆須有先期之培植，言統制則調查統計皆須有預立之規模，苟並此而無之，則所謂計劃云云者，僅成其爲紙上樓台而已，至於國民精神之培養與夫道德心之鍛鍊則又一切建設統制政策推行之先務矣。吾先民知其如此，故其立言曰：「禮樂百年而後興」。又曰「雖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知建設之不易，而言之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曩年愚在醒獅週報嘗爲文討論建國計劃，主張建國事業應分三期，第一期爲休養生息之時期，在此時期政府所應作者祇爲吏治之整飭，治安之保障，其餘一切應儘量讓民間自由發展，使民力由寬裕而充實，人心穩定，國基自固，然後始能進而入於第二期之培植時期，在第二期中，政府應集中全力於交通之開發，教育之建設，使人才與環境兩者均有準備，然後始得再進而言第三期之大規模建設開始，此其意見，至今仍堅持如故，此文發表在十

餘年前，當時正在軍閥內戰時期，民生之凋敝，國勢之淒夷，俱非輕言建設之時，而必以休養生息為主。今雖時異世遷，然而國土淪陷，戰亂相尋，民生之苦痛或更有過於曩日者，然則今日而言國家之建設，吾言或尚不無一顧之價值乎！

建國之要既如此矣，以云抗戰，兵員之補充，財政之徵發，軍備之充實，交通之開拓，在在皆須民力忍受重大之犧牲，此爲國民應有之負擔，無人敢加以反對，然在執行政策之時，亦須同時兼顧國防之需要與民力所能擔負之最大限度，何則？目前中國之抗戰爲國際最大戰爭之一，其性質爲長期的，其最後勝負非僅決於戰鬥之進退而實決於整個國力之充實鞏固的程度，國力何由以表現？表現於民力，更表現於民心。故戰勝之要，在固結民心，安定社會，使一切潛伏的病菌無由發作，能支持至最後五分鐘者，卽爲最後勝利者。而其所以致此，則必在行簡易之政，布寬大之法，使民與環境相安。有樂生之心，無畏死之念，然後始能親上死長，與政府共患難而效死勿去。昔漢高入關，與民約法三章，除秦煩暴，而三秦自定，道偵塗察之術，偶語棄市之禁，一概勿用。馬文淵之邀遊於二帝間也，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反盛陳陸戟以延故交，此井底蛙耳，惟世祖能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是。戰爭之際，文法貴於簡易而不貴於繁苛也，孰謂無爲政治無裨於抗戰哉。

夫無爲政治非委心任運飽食終日無所事事之謂也。特觀爲人上者善執天下之樞機以因勢利導，而不與田夫野老爭一手一足之烈耳。政治一技術問題也，不知爲政之要者，終日驅其政府人員辛苦不休，人人而訓練之，事事而干涉之，似若有爲，而所遺甚多，流弊甚大，此正如手工業技術下之生產事業，所恃僅匹夫匹婦之人力耳。善爲政者則不然，彼以國家爲一大工廠，全民爲一大機器，組之以法度，運之以神智，因其勢而利導之，所費僅彈指之力，而凡百庶事樞紐一動，自若跳丸轉轂而不能自休，此無他，恃機械而不恃人力之效也。無爲政治精意如是而已。

是故善言無爲政治者必謹法度。法度之於國家，猶齒輪引擎之於機器，所以執簡御繁，運萬載於指掌者也。人治之效有限，而法治之效無窮。法治有時而不效者，非法治之無效，乃有法而不能執守之過耳。善爲國者，不貴用人，而貴用法，法不貴繁而貴簡，不貴高深而貴平易，立法之始必度人情之可行者而制之，法一定則不可易，朝令夕改，使人耳目不知所從，雖有聖智無能爲教，法之行必自上，必自近，無有例外。不於法外賞人，不於法外罪人，賞罰之權不操之於一心而一斷之以法，雖布衣走卒皆能據法以爲斷，如是則國是定而人無徼倖之心，人無徼倖之心則自能各奮於所業，而爲人上者可以無爲而治，市恩於私門，門巧於辭室，使有法而不能行，雖日日鞭策其國人，將何

益哉。故善言無爲者，必自謹法度姑。

法度定矣，而所以運用之者則在於審勢，法之形有定，而勢之變無窮。故守法易而審勢難。中人皆可以守法，而上智有時昧於審勢。審勢之要在於不持成見，老子曰「噫其心，實其腹」，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言雖爲修身，可以與言爲政。世之爲政者，每好以一己之見強人以必從，爲其下者又復從而阿諛煽揚之，孔子所謂「意，必，固，我」之蔽，一一皆犯之，雖其善者不過用一人之智而已，將何以應無窮之變哉？此其蔽皆在乎有我。夫專己自私，匹夫小人之事也，而非所語於執政，執政以身任國家之重，則不能不棄小我而就大我，彼其身已臻爲國家之代表，則其所以自處者，非獨個人小己之能而已。故人人可以有爲，而權勢愈高，責任愈重者則愈當以無爲自律，惟其無爲，故能匯天下之智而爲己智，集天下之力而爲己力。其所舍愈多，其所就愈大。易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此豈沾沾於有爲者之所能躋哉。

儒道法皆言無爲，而又皆言因循，因循者無爲政治之核心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時」，因循者。因勢利導之謂也。古之善爲因循之政者莫如管仲，桓公實怒蔡姬，管仲因之以伐楚，今之民古之君也，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圖始，卒然語以非常之業，加以難行之法；莫有不掩耳而疾走者，善爲政者，因其勢而

清 寧 集

善導之，不善爲政者逆其勢而與之爭。夫民猶水也，導水使就下則易，逆水使趨上實難，拂民之欲，而欲以成大功，難乎其爲政矣，夫惟能無爲者，始能審當前之勢因而利導之，及其成功，有過於拂民之欲者萬萬，奈之何其弗思也。

夫爲政者之所以因民之欲而鼓導之者，所恃者何哉？一曰義，二曰利，此兩者人心之所同也。人心莫不有好義之念，因其勢而利導之，則鄙夫可以與效死。抗戰以來，舉國影從，辛苦五年而不稍泮渙者，豈非愛國大義有以範圍乎人心者哉。然徒義又不能以久行也，則又必繼之以利。爲天下者與天下共其利，爲一國者與一國共其利，利散於人則衆集，利集於一己則衆散，故爲國者不患言利而患利之不溥及也。夫人心莫不嗜利，利之所在，不策而自勉，爲國者苟知此義，則行政之推行不必待鞭策之時時隨其後也，無爲政治者無他，與天下共其義，亦與天下共其利而已矣。

中國古聖王相傳之心法曰「允執厥中」，執中者又無爲政治之精意也。世之蔽於宋儒理欲之辨者，每以爲人欲之外別有超然之理，而所謂中者，即懸於此超然之理界內，於是專制之主，偏執之臣，各以其所謂中者責人於廟堂之上，而中之理愈晦。清世宗之著「大義覺迷錄」也，明代諸臣之議大禮爭三案也，皆以其偏私之見而強指爲專理之中，其所爭愈烈，其去中愈遠，而馮道之徒，持橈棧兩可之見者，又誤以調停折衷爲中，